

1103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二十八期

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1年1月3日

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

目 录

- 辛亥革命时期嘉兴记事 陈伟桐(1)
- 辛亥嘉兴光复记 董巽观(24)

编者按：辛亥革命爆发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辛亥革命既是革清朝的命，也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值此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我们特选编两篇史料，以飨读者。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辛亥革命时期嘉兴记事

陈伟桐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在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作者曾参与编辑了《嘉兴辛亥革命历史资料汇编》。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吸收《嘉兴市志》等有关内容编写而成。本文不打算简单地去叙述当年革命党人从事政治活动和光复嘉兴的经过，而是放开视野，从嘉兴至浙江、上海以至日本，凡与嘉兴有关的人与事，且尽量做到：既有革命派的活动，又有立宪派争取和平改革的尝试，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都予以肯定；既反映上层人士的政治发动，也包涵下层人民的民变起事，以至秘密社会、三教九流，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的反清起义，说明辛亥革命是当时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文内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又有反映社会风气等生动材料。告诉人们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总之让读者看到嘉兴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幅多角度、多层面、多色彩的社会画面，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

一、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一方面中国向半殖民地沦陷，另一方面随着“欧风美雨”的东驰，使得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的变化莫过于上海，西方文明大多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嘉兴与上海毗邻，颇能接受近代文明的影响，给嘉兴社会带来种种新生事物。1882年嘉兴开设轮船码头，有了汽船的交通运输工具；1883年嘉兴电报局成立，有了现代的通讯工具；1895年美国基督教会建立福音医院，嘉兴有了近代医疗事业；1896年随着《马关条约》签订，杭州开埠，嘉兴成立分海关，成为对外开放之始；1900年在全国教会学校中享有一定声誉的秀州中学在嘉兴建成；1909年沪杭铁路建成通过嘉兴。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窥见嘉兴近代变化的端倪。

在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以后，维新思潮兴起，嘉兴风气大开，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维新人士。沈曾植、沈曾桐兄弟率先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是为全国第一个维新组织，沈曾植为其“正董”(会长)，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得到过沈曾植的帮助。

海盐张元济是戊戌变法时期(1897年—1898年)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建议的维新官员。当时光绪所读新书都是由他提供和递呈的。

另外，在嘉籍京官及地方大吏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外交官许景澄和两广总督陶模。

许景澄为清末我国重要外交使节，先后13年充任法、德、意、荷、奥、俄国公使。出使时间之长，出任国家之多，在所有外交官中

名列前茅。他思想新颖，在给嘉兴友人的信中说，他为乍浦没有成为通商口岸而晚上睡不着觉。他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与外国列强进行艰难的谈判。但他因不同意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做法，尤其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宣战，而终被慈禧所杀害，为“浙江三忠”之一。被誉为“清末循吏之冠”的两广总督陶模，有风骨，敢于抗疏。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公然主张女子天足。著名维新人士宋恕（1866年—1909年）在谈论嘉兴、杭州和浙西浙东的风气时，说道：“杭州与绍兴一江之隔，而妇女风气殊异。杭州妇女最喜烧香出游，绍兴则以妇女出游为禁。现任两广陶制军为嘉兴人，素恶缠足，其女公子皆不缠足，嘉兴士族颇多化之。然缠足风气向来浙西不如浙东之甚，而浙东又不如闽广之甚；识字妇女则亦浙西多于浙东，与缠足为反比例。”

此外，从清末剪辫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嘉兴一地男子的风气。茅盾是在辛亥年暑假以后，由湖州的省立三中转到嘉兴的省立二中读书的，可是他发现嘉兴剪去辫子的师生却意外的多：“三中的教职员中只有一位新来的舍监是没有辫子的，学生全有辫子，但二中却颇多‘和尚头’。校长是个假辫子，据说因为是校长，常常要见官府，只好‘假’将起来。但在学校中，也常常不装假辫子。某英文教员‘到过西洋’，自然没有辫子。体育教员大概只到达南京或上海，可是也没有辫子。两位算学教员，也没有辫子。国文教员中有三位（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据老同学说，也都是校长的‘同志’。”“有这么多光头教员，自然会教出光头学生来。在我进校的第一学期，这省立二中发生过‘剪辫运动’。结果是我进去的那一级里，剪的最多”（《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

二、敖嘉熊建立温台处会馆及其他

嘉兴酝酿反清革命在全省各地之前。下面列举三个“第一”可以证实：浙省第一个反清组织“浙会”由嘉籍人士在杭州建立；浙省以至全国第一个竞争体育会于1903年在嘉兴成立；1904年在嘉兴建立了浙省第一个革命机关温（州）台（州）处（州）会馆（处州即丽水）。而这一切又与嘉兴早期革命志士敖嘉熊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敖嘉熊，字梦姜，平湖人。出身于一商人家庭，素有大志。戊戌维新时期，深受维新思想影响，致力于经世之学。1899年，为在嘉兴推广改良农业，在嘉兴竹林与唐纪勋等创办学稼公社。第二年又与唐纪勋、祝廷锡创立竹林蒙学书塾，是为嘉兴最早的一所民间小学。

1900年6月，他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生王嘉集（号伟人，又名维忱，嘉兴人）、蒋方震（字百里，海宁人）等人在杭州成立具有反清性质的组织“浙会”研究时事，不久被当局禁止。

1903年，敖嘉熊在上海加入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任职员。这时他模仿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尝用白话文写作《新山歌》一书，传播革命思想，经过蔡元培审定，印刷发行。此书为嘉兴官绅所构陷，于1906年在浙江被列为大案，终由于嘉兴开明士绅陶葆廉（两广总督陶模之子）在浙江巡抚面前为其开脱，得以幸免。

1903年6月底，上海“苏报案”发生，章炳麟及邹容被投入监狱，牵连爱国学社，敖嘉熊被迫离开上海。这时革命思想已波及嘉兴及浙省，敖嘉熊遂回嘉兴建立革命组织，有演说会、教育会及体

育会。后来演说会遭到查禁。其中体育会尤为重要，称“竞争体育会”，由敖嘉熊与褚辅成、田月斧创办。竞争是指时代而言，体育是指要强国必先要强身而言，其活动不限于体育一项。一直至辛亥革命前，它是嘉兴最主要的半公开的革命团体。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秋瑾年表（细编）》，经考证指出，嘉兴的竞争体育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体育会”。

这一年，敖嘉熊还在上海时，就和乐清人陈梦熊等谈起，温台处人移居嘉兴者甚多，他们性情强悍，可以作为反清起事的骨干力量，于是就有了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的计划。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进入江、浙两省。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锐减，出现大片荒地。于是在19世纪后期，大批浙东、温台处各州的移民进入此地。这不仅引起主客籍居民的冲突，而且由于官府趁机对客民加额征收，进行勒索，客民苦不堪言，也加深了客民与官府的矛盾。在嘉兴设立温台处会馆，可以由会馆出面为客民代纳租税，以免遭官府之苛索，又可以缓和主客民之间的矛盾，因而得到本地以及温台处士绅们的支持。于是在1904年春，敖嘉熊出资在东门内购地，是年秋建成会馆。

温台处会馆，由敖嘉熊推举魏兰（仁和人）为总理，聘魏毓祥、丁铎、陶成章、吕熊祥、赵卓、陈乃新、魏毓番、魏仲麟、冯豹、陈梦熊等为执事员，联络各地会党，建立地方团练。这样，温台处会馆成为浙江省第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冯自由称会馆“执全浙革命党之牛耳”，“浙东各府志士咸荟萃于是，隐然奉嘉熊为领袖。”1904年冬，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之后，会长蔡元培“以敖嘉熊素负重望，亲至嘉兴邀之订盟”。革命党人陶成章从日本回国，通过嘉籍党

人龚宝铨介绍，到嘉兴与敖嘉熊商议浙江独立军事及联络苏、浙、皖、赣四省起义的计划。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初到嘉兴，就是经过敖嘉熊与褚辅成介绍，到南潯（时属嘉兴）潯溪女子学堂任教的，结识女界同志，扩大革命队伍，如桐乡徐自华、徐小淑姐妹。在革命准备的前期，嘉兴一度成为全浙的反清中心。

然而这一局面约维持一年，至1905年春，敖嘉熊迭遭家难，加以敖家原在嘉兴北门开的腌腊店营业亏损。为支付会馆经费，他不惜变卖妻子的金银首饰。后来终因无法维持而解散。然而散馆后，各地同志仍至嘉兴与敖联系。此后温台处会馆一批骨干，遂转移到绍兴由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继续实行原温台处会馆制订的革命计划。这就是浙江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中心的前后承继关系。

在“浙案”发生前，秋瑾两次来禾商议共同起义一事，亦为敖嘉熊接受。1907年7月皖浙两案发生，先是徐锡麟在安庆击毙安徽巡抚恩铭，宣布起义，旋即以身殉。受徐锡麟牵连，原准备在浙起事的秋瑾在绍兴被捕，英勇就义。敖嘉熊不仅事前参加谋划，而且在皖浙行动的同时，推动余孟庭在嘉兴起义，进行配合。

平时敖嘉熊的反政府倾向是十分强烈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嘉兴，他都白天提着灯笼走路，当旁人问他何以如此时，他回答道：“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所以人家都称他“敖毒头”（意即神经病）。可是敖嘉熊“纵迹屡变，人莫能名”。他的好友祝廷锡发现，敖嘉熊从上海回来之后，“韬晦敛抑，以醇酒妇女自掩”，经常出没酒楼、妓院等帮会分子常去的地方，避人耳目。他还创立一黄帝教，制订福书祷词及各种秘密暗号，所以有人称他为“浙省会党巨子之一”。

敖嘉熊作为浙省革命党人的领袖，屡次反清行动都与他相关。

清政府曾多次想加害于敖嘉熊，都没成功。1908年3月，清军在镇压余孟庭反清起义的同时，决定除掉敖嘉熊。一日敖嘉熊以事晚出不归，一周之后才发现他被清政府派密探暗杀于嘉兴乌木桥河中。

三、关于龚宝铨

龚宝铨，字薇生、未生，别号味荪。浙江秀水人。出生于世代医家，兄弟多人中唯其没有继承祖业，从事革命。冯自由称龚宝铨为“光复会之最初主动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龚即怀光复志。1902年，年仅17岁的龚宝铨游学日本。第二年，在抗议俄国占领东北的拒俄运动中，在日本先后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他被推为浙江归国实行员，在上海新闻路余庆里，组织机关部，欲从事暗杀等军事行动。时值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从青岛回到上海，龚宝铨与莫逆之交陶成章邀其商议成立反清秘密团体。在拟订完章程之后，光复会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成立，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此后，光复会的骨干之一徐锡麟提出，欲起事必先集资捐纳官职，凭借权力便于军事政治活动。而龚宝铨却不同意这样做，他在《自叙》中称：“而余终守直道，不欲诡政权藉以倾覆人，故与焕卿（陶成章）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蹶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天幸得免于祸。”浙江多项革命行动，均参与其中，而龚宝铨从小体弱，其艰难危险的形状可想而知。民国以后他一直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不愿再从事政治了。可能由于看破红尘，后来向同邑沈曾植、范古农（居士）及会稽马一浮学习起佛学来了。

四、嘉兴民变此起彼伏

在封建时代，嘉兴地区素来赋税苛重，但由于农业收成尚好，

且有蚕桑收入作补充，农民生活尚可勉强维持，所以向来不是农民起义的突发区。然而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一反常态，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嘉兴，抗租抗税的民变不断，以至发生捣毁官府的武力冲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

海宁“烟管头造反”。1907年10月，海宁因遭虫灾，晚稻严重歉收，每亩不足一担，而海宁地主蛮横地要农民所种的已被铁路公司征购去的田地仍旧交租，这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暴动。从路仲伊桥、斜桥、庆云桥，直至硖石镇、诸桥、祝桥、酈墅等村的农民，聚众上万，分两路攻打城镇。一路向袁花镇、虬墩、八寺庙、马桥、新仓、旧仓等处进发；一路攻入硖石镇，进围海宁城。崇德县的一些农民也投入了战斗。后来由杭州调集军队镇压，捕杀暴动领袖施福生，才使这场暴动平息下去。

桐乡农民的两次“闹漕”。1907年嘉兴水灾严重，秋收减产。1909年夏秋又发生几十年一遇的大水，粮食颗粒无收，而官府继续向农民追逼交纳漕米（旧时指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称漕运。漕运的粮食称漕米），终于在桐乡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抗漕斗争。其爆发的原因，正如当时的《东方杂志》所揭露的，“桐乡之闹漕，则以本年被灾甚重，图董（图为乡以下基层组织，图董负责收缴田赋）勘报荒熟，不免徇私；而吏胥之需索，只浮于正供。乡民饥不得食，重以收漕在即，计无复之，遂乃铤而走险也。”地方官吏为了一己私利，不报荒情，照常催征，激化了矛盾，天灾加上人祸，终于酿成巨变。

1910年1月中旬，桐乡县乡民愤于图董对灾民见死不救，又迫于无所得食，数千农民集约到富户家中索食。15日，官府悍然张

贴布告，坚持照旧开征漕粮，这就激起了乡民的愤慨。乡民愈聚愈多，终于夺门进城。官兵无法抵挡，农民焚毁水师船一艘，夺取了枪支弹药，捣毁了县衙，拆毁了便民仓，焚燃了城门。便民仓原是贮备粮食，待荒年救济灾民的。然而由于官吏腐败贪占，仓存谷空，徒有其名，乡民把它拆毁原属情理之中。后来浙江官府派大军到桐乡，农民始散去。官兵乘机捕去乡民十余人，将一客民斩首，才将这场抗漕斗争镇压下去。

嘉兴素来是我国富庶的地区，这里频繁发生民变，说明了清朝末年农民的贫困化和乡村危机的严重存在。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动摇了清政府在江南的统治基础，使它如即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境地。海宁、桐乡等地的民变暴露了嘉兴一地清政府统治的弱点，为辛亥时期革命志士的光复作了有益的演习。

五、“太湖强盗”余孟庭领导反清起义

在1907年至1908年，与民变相联系的是由盐枭余孟庭领导的反清起义。民间历来将活跃于太湖、长江下游一带的盗匪，称之为“太湖强盗”。从19世纪后期以来，这里活跃着一支支盐枭队伍。

余孟庭，安徽庐江人。因他开局赌博，被收禁于秀水监狱之中。后来他越狱逃跑，在江苏震泽结识盐枭头目管大、李能掌、夏小辨等人，并加入他们的行列，很快被推为领帮。1907年，他又与太湖盐魁夏竹林部汇合，发展壮大为拥有战船四五十艘、快枪300多支、500多人的队伍，成为活跃于浙北、苏南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时，嘉籍革命志士敖嘉熊闻余之大名，派人前往联络，接着

又亲自与余孟庭见面，用革命道理反复开导，余孟庭接受革命思想，“此后约束其众尤严，教引为同志”。20世纪初，革命党人经常将秘密会党作为依靠力量，并对其消极破坏的一面加以约束。于是余孟庭立下营规三条：一、不许扰乱乡民；二、不准妄杀无辜；三、不许强奸妇女。他高举“劫富济贫”的旗帜，在嘉兴府属各县焚局卡，逐清吏，夺取官府及富家的粮食赈济饥民，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乡里穷民望孟庭军旗，俨犹大旱之望云霓。孟庭之名震于沿江上下游诸省。”余孟庭作战勇敢，有丰富的指挥才能，他提出游击战的“三不战”原则，即地势不合不战，战军精锐不战，无退路不战，有力地保证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下面列举一些他们的战果：1907年农历六月初，他们劫去嘉兴西门外军械所存有的火药百余桶。初八夜又袭击嘉兴南汇镇防营，将营中新式枪炮等物劫夺一空。七月初十日，余孟庭率部进入油车港镇，抢劫富家20余户。“嗣在嘉湖两府迭与官军打仗劫案累累。”至1908年又袭击招商局轮船、挂洋商招牌的戴生昌轮船及日本大东公司的轮船。盐枭的起义惊动了江浙两省巡抚，引起外国侵略势力的恐慌，也震动了朝廷。于是朝廷特派江苏布政使瑞澂督办苏、松、太、杭、嘉、湖缉捕清乡事宜，且命江浙两省“合剿”，限期捉拿枭魁余孟庭。

当时，清政府密派奸细混入起义部队，散布清营运送军械船只将经过枫泾的假情报，引诱起义部队上圈套，同时派三十五、三十六标(旅)数百名官兵在枫泾埋伏等候。夏竹林轻信谣言，急欲劫夺军械，领兵枫泾。可是余孟庭认为“枫泾为潮水之河，进退不便”，加以制止。夏竹林不听，中敌人圈套，枫泾一役大败，夏竹林战死，精

锐尽歿。于是余孟庭决定取道回皖，“纠集幼时同习技击者共来江南，收合余烬，再兴义师。”不料其藏身于江苏青浦金泽弥港土地庙时，为间谍发现跟踪，不幸被捕，解往苏州。他坚决拒绝瑞澂的招降，终于1908年3月24日，慷慨就义于苏州废王基教场，年仅36岁。

余孟庭领导的盐枭队伍，与清军转战于苏、松、嘉、湖、宁、杭之间，大小战役40多次，战无不胜，斩杀清兵及团勇2000余人，将校百余名，战绩辉煌，给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以直接的打击。

六、立宪派人士领导保路运动

在革命党人积极开展反清活动的同时，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了保护和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的运动，从内部瓦解清王朝的统治。

自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历次武装起义的打击下，1906年7月，清廷正式下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以缓和社会矛盾。这样立宪派就大大活跃起来了。沈钧儒，嘉兴人，清末法科进士，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他和同科举人和进士、贵州人熊范舆，组织宪政讲习会。1907年10月，他们起草了《民选议院请愿书》，专门携带回国进京赴都察院呈递。这是当时第一份要求清廷开设国会的请愿书，所以沈钧儒说过：“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1909年，沈钧儒应浙江巡抚增韞聘任，作为筹办处总参议，参与筹建浙江咨议局。9月，他以嘉兴府咨议员身份参加省咨议局成立会，会上沈钧儒当选为副议长。此外，嘉兴的陶葆霖（两广总督陶模之子）当选常驻议员，褚辅成成为候补常驻议员。为了配合咨议局的活动，沈钧儒还在嘉兴成立了人民建议协会，负责将人民建议提交咨议局。这在全国是极其个别的。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我国资本输出，美国和英国都想攫取浙江的筑路权。为了保护路权，1905 年 7 月，浙江在沪绅商决定集资自办铁路，创设浙江铁路公司，与江苏铁路公司一起完成从上海至杭州铁路的修筑（此路于 1907 年动工，1909 年竣工通车）。浙路公司公举山阴汤寿潜为总理，张元济初被推为股东代表，后任董事会董事。接着全省各府纷纷成立浙路维持会，嘉兴的维持会是成立最早的。在此路兴建初期，清政府是同意江浙自造的，然而不久它又推翻这个决定。1907 年 10 月，朝廷颁发借款修路的谕旨，把路权出卖给英国，这就在江浙掀起了拒款保路风潮。在上海，张元济作为浙江旅沪学会会长，领导了拒款运动。12 月他又被推为代表入京与政府磋议收回自筑事宜。此外，因为沪杭路浙江境内路段主要在嘉兴府办理，与嘉兴关系密切，因此嘉兴的反应特别强烈。据《嘉兴市志》所载：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十六日（农历，下同），杭州成立浙江国民拒款公会。

十月初十，嘉兴绅商学界在府明伦堂组织嘉兴国民拒款会，呼吁七县绅商士民“速集路股以救危亡”。

十月十八日，嘉兴拒款会再次集议，致电浙抚，措词强硬，谓“借外款，浙人死不承认，乞公以去就力争，否则事变难料。东南正多荆棘，愿公为浙计亦为自计。”

十月二十日，全省国民拒款会召开大会，各省和本省各府代表到 3000 余人，嘉属代表褚辅成被选为副会长。

十月二十一日嘉兴旅沪同乡在上海嘉郡会馆集会，声援保路运动。是时，在张元济主持下，浙江在沪同乡多次集会进行保路活

动，筹集股款达 2200 余万元，嘉兴籍同乡由张元济代认股 100 万元。

嘉兴士绅于十月二十八日在精严寺再次开拒款会，到 300 余人，褚辅成、陶慧斧、徐忍茹演说，“语意俱激昂，闻者都为涕下”，当场众人认 200 整股。另嘉兴商会总理认零股 10 万元，会董 9 人认零股 5 万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五月九日，全省铁路保存会在杭州白衣庵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嘉兴认股 50 万元。以后数年，各地都组织缴纳了股款。

此外，海宁的行动尤为积极。十月初，海宁召开大会，成立浙路海宁拒款会，通电政府，会后拒款会长杭辛斋被捕。

.....

在全浙人民的努力下，取得自建铁路的胜利，而且它是全国各商办铁路中招股成绩最好，工程进度最快，成本最低的一条。可是清政府还是与英国签订筑路借款合同，取消商办，出卖路权，都遭到了江浙人民的抵制。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参奏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出卖路权，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从而，激怒了清廷，于 1910 年 8 月将汤革职。

朝廷的决定引起了全浙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也把坚决保路的浙江咨议局议员推到了与政府对立的方面。他们认为，浙路属于商办铁路，政府颁布的商律是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按照商律，公司总理由董事会选举授权，政府擅自将总理革职，违背国家法律。

9 月初，副议长沈钧儒和部分议员曾两次联名具呈，要求召开临时大会讨论此事。巡抚增韞不允。10 月常年会议召开，咨议局通

过决议，请增韫代奏朝廷收回成命，增韫又不允，咨议局则坚持罢会停议。此后巡抚增韫曾五次要求开会，议员都不予理睬。副议长沈钧儒与议员阮性存曾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最后在答应代奏之后才同意复会。如果说1911年前席卷全国的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线的话，那末苏杭甬铁路的保路运动是关键的一役，影响于全国者至大。

沈钧儒于1910年初到北京，看到清政府无心召开国会，发现预备立宪完全是场骗局，回来以后把想法和大家讲了。浙江和嘉兴的立宪派人士，见和平改革无望，很快就与革命党人结合，投入准备浙江光复的工作中去。嘉兴士绅方於笥、陶葆廉、祝心梅等尤同情革命，或斥资接济或暗中掩护，而在路权上立宪派与朝廷的激烈冲突，使得他们很快转向革命。

七、浙江省与嘉兴府的光复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各地纷纷响应，全国形势急转直下。

如果将浙江省的光复准备，分为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话，政治方面则是由褚辅成直接负责的。在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立即到上海，与陈其美（中部同盟会主持人）商量浙江光复事宜，并谋求枪支接济。是月中下旬，陈其美亲至杭州布置江浙光复计划，确定“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的行动方案。后来形势发生变化，11月4日上海光复，浙江革命党人决定立即行动。

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浙江巡抚增韫和杭州将军德济，已加强了杭州的防卫，将杭州的驻兵增至10余营。为了促使驻杭清军投

降，沈钧儒亲自到抚院，请增韞拆除满人营墙，宣告独立。增韞不答应，革命党决定在第二天(11月5日)半夜行动。然而增韞为了防止革命党人强攻，11月5日晚先引诱褚辅成进抚院，把他软禁。这样，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行动，于当晚10时，受革命党影响的新军八十一标(标即旅)在代理标统朱瑞(海盐人)领导下，八十二标在标统周承蔭(海宁人)率领下会同敢死队，由郊外攻入杭城，占领并烧毁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中心巡抚衙门。这时，沈钧儒亲往咨议局，降下了清朝黄龙旗，升起了象征光复的白旗。起义部队生擒了巡抚增韞，并将他押送出境。

第二日，杭州光复，但是位于西湖边的旗营，凭借实力，拒不投降。其协领叫贵林，在满人中尚属开明的，与立宪派人士有所交往，在保路运动中支持汤寿潜，且过从甚密。他之所以不投降，是由于对革命派缺乏信任。这样，汤寿潜就成为向贵林劝降的最佳人选。事亦凑巧，汤已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正被沈钧儒等咨议局议长电邀至杭州赴任。

关于新都督的人选，在起义前几天，革命党人就此进行过商议。同盟会会员朱瑞提出由褚辅成担任，但是褚辅成从全局考虑，认为“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挑一员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而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是位无可争辩的领袖，众望所归，大家就同意他出任都督了。

当天(6日)下午，汤寿潜来到杭州，立即与贵林进行谈判，在革命派答应保障旗民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他们放弃抵抗，于是杭州全城光复。顺便提及，嘉兴计宗型(号仰光，同盟会员，嘉兴府中学堂物理教员)参加了杭州光复，且战功卓著。浙军四十九旅司令部

编《新军杭州光复记》载：“第三营出发时，并有理化家计宗型，随同攻毁，与有力也。”

在上海、杭州光复的过程中，嘉兴人民正热切地盼望光复。对此，作家茅盾在《我所见的辛亥革命》里，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宝贵的历史资料。

文中谈到，他在嘉兴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光复的消息，他们怎样心切地等候从上海来的火车，千方百计地从旅客或是茶房手里，转买到上海发行的报纸。这些报纸当时在嘉兴还属于违禁品，可是他们得到报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哄动”。过后不多几天，当局管严了，车站上紧张起来了，报纸买不着了，可是大家都在猜测革命在“着着胜利”。接着是城里米店涨价，校内存米不足，学校宣布临时放假了。他回到乌镇老家以后又怎样呢？他写道：“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的‘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旗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这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说明清朝统治正处在摇摇欲坠之中。

褚辅成对嘉兴准备光复的组织安排是这样的，嘉兴地方由方於笥（号青箱，秀水学堂监督）负责，革命机关设在精严寺藏经阁内。为策应上海起事，派陈以义（字仲权）驻上海，担任杭州方面联络的是计宗型。后来为加强上海方面联系，再指派庄幼山到上海。

嘉兴府的光复比杭州晚10天，是11月17日光复的。此时，浙省各府听说杭州光复，相率反正，惟有嘉兴统领沈沂山，拒绝方於